

## 摘 要

作为在台湾政坛已具备执政实力的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不仅是影响该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对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试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民进党“台独”路线的演变及其原因和实质进行分析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前言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写作意义和资料来源。

第一章，“住民自决”——党外和民进党成立初期的政治主张。主要介绍七十年代党外势力的崛起和党外“住民自决”主张的提出和发展，并分析党外“住民自决”主张的实质。

第二章，从“住民自决”到“台独党纲”——民进党“台独”诉求在内外斗争中升级。主要介绍民进党成立后党内不同派系在“台独”路线上的分歧，民进党逐渐提升“台独”诉求并沦为“台独党”的主要表现。分析民进党不断提升“台独”诉求的原因，并对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作简要评介。

第三章，从政治理念到政治实践——民进党“台独”主张的具体化和政策化。本章在分析九十年代初台湾岛内外政治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介绍民进党“台独”主张在“内政”、“外交”、文化和大陆政策等方面的具体化和政策化。民进党通过这些内外政策来凸显其“台独”立场，并以此作为反对国民党、争取执政权的武器。

第四章，从“反对利器”到“执政包袱”——民进党“台独”路线的全面调整。本章主要分析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进党进一步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阐述民进党在施明德和许信良两位党主席主导下，全面调整“台独”路线的具体内容。并对民进党“台独”路线未来的发展方向作简要分析。

结语概括本文的几个主要结论。

关键词：民进党 “台独” 路线

## 前 言

“台独”即指“台湾独立”。甲午战争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和日本殖民者进行斗争，台湾人民曾树起过“台湾独立”的旗帜，其目的是要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我们今天所泛指“台独”，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概指二战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运动和思潮。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当时驻扎台湾的部分日军少壮派军官串连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等御用绅士，发动了“台湾独立自主运动”，企图阻挠台湾归还中国，后因当时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的反对而阴谋未遂，此为二战后“台独”运动的滥觞。此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采取了严厉的打击，“台独”势力无法在岛内立足，纷纷避逃海外，在日本和美国的扶持下继续从事“台独”活动，并先后形成了日本和美国两个海外“台独”活动中心。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变迁，“台独”运动又重新在岛内出现，并且日渐猖獗。

1986年9月28日，在七十年代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党外势力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政策，成立民进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民进党已成为台湾政坛最大的反对党，并已具备了“执政”的实力。民进党的成立和“台独”势力在岛内重新抬头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政治事件，民进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和“台独”有着不解之缘。民进党成立之初即将带有分离主义意识的“住民自决”列入党纲，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又不断提升其“台独”诉求，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专制体制挑战的武器。1991年，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正式贴上了“台独党”的标签，且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但“台独”毕竟不为岛内大部分民众所认同，也受制于岛内外现实政治环境，使得“台独”渐渐成为民进党进一步发展和取得执政权的沉重包袱。不甘于长期屈于在野党地位的民进党，不得不对其“台独”路线进行全面调整。

“台独”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问题，也是攸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所以“台独”一直是当代台湾研究中的主要课题。民进党成立之后，作为对台湾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在野党，民进党及其“台独”路线从该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两岸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1993

年 12 月，台湾海峡评论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学者林劲所著的《“台独”研究论集》，该书汇集了作者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多篇研究“台独”的论文。该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贾亦斌编著的《论“台独”》。此外，1994 年 10 月大陆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黄嘉树所著的《台湾能独立吗——透视台独》一书。以上三部专著都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台湾研究民进党的专著也不少，这些著作大都涉及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敖的《民进党研究》、《中国时报》资深记者杨宪村所著的《民进党执政》和民进党前政策会执行长郭正亮所著的《民进党转型之痛》。除此之外，大陆和港台地区还有不少相关论文发表。但上述专著和论文大多针对民进党某一阶段的“台独”路线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有的是偏重于“台独”发展，有的则是对民进党的整体研究，而对民进党“台独”路线的发展和演变均未作全面和系统的探讨。所以对民进党及其“台独”路线的研究虽然已经比较深入，但仍有不小的空间存在。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间，希望通过对民进党“台独”路线演变的研究，对民进党的发展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在写作上，本文采取叙述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民进党不同时期“台独”路线的论述，勾勒出民进党“台独”路线演变的全貌，并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不同阶段民进党“台独”路线的成因及实质作初步分析。本文的资料来源以台湾报刊和杂志为主，民进党的一些重要政策也是从相关的新闻报导中获取，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得到原始文件一一核对，加之本人学识有限，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 第一章 “住民自决”——党外和民进党 成立初期的政治主张

1949 年以后的台湾是世界政治的敏感地区之一。一方面，它成为被赶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块栖息地，为了站稳脚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建立

起了一套严密的专制统治体系。另一方面，台湾也成为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反共”的需要，虽然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仍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支援和帮助，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维护其专制统治。但专制的“铁屋”终究经不起时间的长期剥蚀。从五十年代开始，一批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向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发起挑战，历经七十年代党外势力的不懈斗争，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终于得到全面推进。1986年9月，党外组党成功，民进党成立，迫使国民党当局在不久之后即开放“党禁”和“报禁”，并废除了实行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时至今日，国民党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政党政治基本确立，一个“开放社会”已在台湾初步形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追求民主”的美妙大乐章之中，“台独”——这一不和谐的音调也悄悄响起，并在民进党成立之后愈加清晰和高亢，终于一度演变成民进党的主旋律。

民进党是由党外势力结盟而成，民进党成立之初，包括台湾前途在内的各种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沿袭于党外，对民进党“台独”路线演变的探讨，也必须追溯到党外时期。

## 第一节 党外势力的崛起

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实行党禁政策，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组织政党，各种反对力量只好用“党外势力”的名称，以区别于当时合法存在的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中国》为阵地，形成了一股反对力量，他们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进行抨击，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求实行两党政治，并进而准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这是台湾党外运动的起源。1960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筹备组党的主要成员，关闭了《自由中国》杂志，使刚刚萌芽的党外运动遭受重挫。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党外势力开始重新崛起，并成为对国民党产生一定威胁的反对力量。

党外势力的崛起是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台湾战后经济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恢复稳定时期和进口替代时期之后，到六十年代初期进出口

扩张时期，国民党当局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将岛内市场延伸到国外，参加国际大循环，使台湾经济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中期得到了高速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1961 年 1973 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786.40 亿元新台币增加到 2553.21 亿元，即 1973 年是 1961 年的 3.25 倍。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10.1%，其中工业增长率为 19.4%，农业增长率为 4.6%。<sup>[1]</sup> 台湾成为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地区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以台籍私人企业集团及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大批涌现，并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台湾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结构飞跃，从农业经济变成工业经济。“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是社会体系中的公民及其结构发生变迁”，<sup>[2]</sup>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中小企业主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这为党外势力的崛起奠定了阶级基础。

党外势力崛起的直接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开放“增额中央民代”的选举和舆论的有限度开放。

五十年代初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为了消弭因“二·二八事件”而广泛存在于台湾民众心中的不满和怨恨，着手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开放进行“村里长、乡镇长、县长及省议员、县市议员和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省市长”则实行官派，对于“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党为了维持其“法统”地位而拒绝改选。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做法，日益引起了岛内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一些热心问政和参政的社会名流，对国民党当局仅开放“县市长”以下公职选举已不满足，他们强烈要求扩大选举范围，明确提出民选“省市长”和“中央民代”，而被称为“万年国代”和“终身立委”的“中央民代”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另外，从“中央民代”自身情况看，经过 20 多年的时间，已有不少“民代”凋零过世，使得“中央民意机关”出现严重人数不足的问题。面对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终于在 1969 年作出决定，补选“国代”15 人，“立委”11 人，“监委”2 人，即所谓“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此后，除了 1978 年因中美即将建交而中止一切选举活动外，台湾都定期进行“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增额的数量也逐次有所增加。

国民党当局这种部分开放“中央民代”的选举，并不会对其政权产生哪怕是一点点轻微的撼动，因为这样的选举国民党总是凭藉其强大的政经资源以及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予以操纵，使增额席位大部分为国民党候选人所攫取。加上国民党原有的“万年国代”和“终身立委”，当选的党外人士在“中央”民意机

构中势单力薄，只能有发言的声音，对各种决定案的通过或否决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把党外人士的政治活动范围由以前特定的县市扩大到全岛，走向更大更广的政治舞台。“增额中央民代的选举”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选举，也成为党外势力积极参加的主要政治活动，并为党外队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契机。一方面，选举造就了一批具有全岛性影响的党外政治精英，如黄信介、康宁祥等；另一方面，党外势力也借选举活动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外的影响。

同开放“增额中央民代选举”一样，舆论的有限开放也为党外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对舆论的严加控制，是国民党当局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的新闻、通讯、报纸、电台、电视台无一不牢牢掌握在当局的手中，凡是触及国民党蒋家政权的言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五、六十年代，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等就因此而锒铛入狱。

七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封杀舆论的冲击越来越强烈。而当时正着手实行“政治革新”的蒋经国迫于国际形势及台湾政局的变化，也为了改变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形象，开始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稍稍放松了对舆论的控制。1968年创刊的《大学》杂志很快成为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向当局建言和发表政见的重要阵地。继《大学》之后，《台湾政论》、《夏潮》、《八十年代》和《美丽岛》等相继在七十年代问世。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党外人士不间断的努力，党外杂志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进入全面兴盛时期。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时，已有三十多本党外杂志创刊或复刊，这些杂志大多由党外公职人员创办，如许荣淑的《深耕》、周清玉的《关怀》、尤清的《博观》等。他们通过办杂志发表政见，培养党外力量，使得党外杂志成为党外势力“储蓄和培养人才的园地”与“提高党外思想和理论层次”的阵地，<sup>[3]</sup>对党外势力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故党外杂志也被人形容“是党外机器的马达”。<sup>[4]</sup>需要指出的是，党外杂志虽多由党外公职人员创办，但杂志的采编人员却主要是由一些年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这些人多具理想主义色彩，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党外精英，他们对党外公职所坚持的温和斗争路线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也由此埋下了民进党成立后路线斗争的种子。

尽管蒋经国主政以后对舆论的控制有所松动，但舆论的开放是十分有限的，党外杂志的言论一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上述杂志也在国民党不间断

的“查、扣、关”的搔扰之下大都有始无终。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与党外势力的多次冲突，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数“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

创刊于1979年8月的《美丽岛》，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很快成为党外杂志中的翘楚。该杂志发行人黄信介，社长许信良，副社长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张俊宏，总经理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杂志的社务委员达61人，几乎网罗了台湾所有的党外知名人士，实际上已初具政党雏型。《美丽岛》创刊后，除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进行猛烈的批判之外，还在全岛各主要城市设立了二十多个分社和服务处，进行了一连串的群众聚会。《美丽岛》杂志的激烈言论已让国民党当局难以容忍，杂志社类似于政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更引起国民党的警惕和不安，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一场大的冲突在所难免。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和“台湾人权委员会”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大会”，但当局不予批准。12月10日，杂志社不顾当局的阻拦，如期举行集会。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进入市区。结果引起双方激烈的暴力冲突，致使20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台湾当局组织舆论声讨，称黄信介等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进行“叛乱”。接着又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黄信介等党外人士152人，《美丽岛》集团的核心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国民党当局组织军法大审判，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等44人分别被判处1至14年有期徒刑。在审判期间还发生了“林义雄灭门血案”，林义雄的母亲和两个女儿惨遭杀害。经此事件，党外反对势力元气大伤，党外运动一度陷入低潮。但“美丽岛事件”也使党外人士的思想获得了广泛传播，而“美丽岛事件”受难人家属和辩护律师也因此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一股新兴的党外势力。民进党成立后不久，“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均已先后出狱，他们及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大多成为民进党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开放“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和舆论的有限开放，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舞台。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党外人士为了扩大影响，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一些诸如“一党专政”等禁忌问题。到70年代末，涉及台湾前途的政治主张——“住民自决”也终于在党外阵营中冒了出来。

## 第二节 党外“住民自决”主张的提出和发展

以“自决”作为对台湾前途的主张最早是由“台独”分子提出。“二二八事件”爆发后，1947年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美国驻台领事馆海军情报官乔治授意当时正住在上海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向魏德迈递交所谓的《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声称“台湾有台湾自身特殊的条件，现在台湾人民唯一的出路，只有争取自决权，暂时摆脱中国的统治”，这是“自决”主张提出的肇端。1964年，曾任过台大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与其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共同制作了一份《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传单，这个宣言虽未公开提出“自决”的要求，但宣言提出的目标和主张“实已涵盖了今日‘自决’的所有重要见解，成为海内外‘台独’或‘自决’人士的理论源头”。<sup>[5]</sup>正式将“自决”和“台独”联在一起的是美国“台独”运动负责人陈隆志，1967年，陈隆志与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合著了《台湾、中国与联合国》一书，书中建议：“应由‘中国’占有当时‘国府’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拥有的两个席位；同时，台湾则经由自决获得独立，并保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sup>[6]</sup>而台湾本岛最早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是在1971年。这一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公开宣布将访问中国，岛内危机四伏。一向主张“台独”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教会公论报》上发表了《国是声明与建议》，提出“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决定”。<sup>[7]</sup>长老教会的“自决”主张很快得到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响应，并在海外“台独”势力中蔓延，成为七十年代海外“台独”势力的主要政治口号。1974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成立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世台会）和次年在美国成立的“台湾独立联盟”，都把“自决”列入自己的成立宣言。

党外势力提出“住民自决”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8年，台湾新一期“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又将登场，由于在前一年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了30%的选票，而且爆发了令国民党难堪的“中坜事件”。党外势力准备挟上年选举获胜的余威和“中坜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民气，在这次“中央民代”选举中放手一搏。为此，党外精英尽出，还第一次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当党外势力群情激昂地期待一次更为辉煌的胜利的时候，传来中美即将建交的消息。为了避免内外矛盾的激化，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12月16日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其中就包括“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对于停止选举一事，党外迅速作出反应。在蒋经



国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合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要求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同一天，康宁祥、王兆钊联合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台湾之未来应由现在之一千七百万居民共同决定”。<sup>[8]</sup>此为党外人士首次提出“住民自决”。12月25日，党外势力在竞选总部再次集会，黄信介、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余登发等50余人共同签署《国是声明》，也提出“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共同决定”。<sup>[9]</sup>79年4月美国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后，康宁祥、黄信介在“立法院”给“外交政策当局的建议质询”中，又进一步建议当局积极展开弹性外交工作，争取具有法律基础的外交，力促国民党当局重新加入各国际组织。党外人士在同时发表的《国是声明》中，还主张“应再努力争取我国在联合国应有的会员资格”。<sup>[10]</sup>以上这些声明和质询，大致构成了党外势力关于“住民自决”主张的雏形。

“住民自决”逐渐成为党外人士的共同主张，并进而成为党外人士竞选的共同政见是在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的推波助澜与此有直接的关系。1980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重新调整对台政策，将《与台湾关系法》视作“维护我们（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官方的充分基础”。<sup>[11]</sup>1982年，美国国会邀请以康宁祥为首的四位党外“立委”、“监委”访问美国。他们在访美期间一再阐述“一千八百万人民共同决定台湾命运”的论点，并与以“造成有利于台湾人民自决和自立的国际环境为宗旨”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及诸多海外组织取得了政治上的共识。康宁祥等在美国的一系列活动促使“住民自决”的主张在党外进一步泛滥。在回国后不久的“立法院”质询中，康宁祥等党外“立委”首次“以‘自决’的观念向‘行政院’质询，要求‘行政院’以自决原则突破外交逆境”，引起岛内舆论的轰动。<sup>[12]</sup>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又通过了强烈暗示“住民自决”主张的“台湾前途决议案”，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接受”。这个决议案虽然最后被参议院否决，但“它所隐含的‘自决’精神却由海外“台独”人士引进到了岛内，渗入台湾民主运动的主流”。<sup>[13]</sup>在这一年年底的选举中，“住民自决”正式成为党外候选人竞选的“共同政见”。

民进党成立后，在台湾前途的问题上依然沿袭了党外“住民自决”的原则。86年民进党首次通过的党纲中明确提出：“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联合，都没有

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sup>[14]</sup> 这种提法和党外时期的主张并无实质差别，但民进党成立后对“住民自决”的诠释和党外时期相比，已出现微妙变化。

第一、民进党的“住民自决”已有较系统的理论基础。“住民自决”的主张直接继承于党外，但党外提出“住民自决”后，并没有任何人对此作过比较清晰明确的解释，其作用主要是用来在竞选时作为吸引选民的口号。党外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正杰就说过：“党外提出这个政见（住民自决）时，我发现大多数的候选人对这个政见都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个政见提出来，到后来也没有强调它”。<sup>[15]</sup> 既然仅仅只是将“住民自决”作为竞选时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招幡，也就不可能对此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归纳。民进党既已将“住民自决”明确载入了党纲，就不能再仅仅将它作为竞选的工具，对它的解释也不能再含糊其词，如此方能为民众所认同。民进党成立后，江鹏坚和尤清都一再强调民进党的“住民自决”是建立在“国民主权原则”之上，人民有权利来决定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政治体系。后来谢长廷又提出了“台湾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台湾命运共同体”是脱胎于海外台独温和派于70年代提出的“台湾国民主义”，该理论认为：近代独立国国民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以相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作为基础，而是根据于强烈而深厚的共同命运的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在长期共同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sup>[16]</sup> 此后这种理论在岛内也不时有人提及，但影响并不大。87年1月，谢长廷在与赵少康就《台湾与中国前途》进行辩论时才系统地提出了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新台湾意识”。谢认为：“台湾面临中共政权的强大压力和威胁，所有住民自然形成台湾岛内命运共同体的台湾意识，这是包涵所有本省、外省同胞，也包涵国民党在内的一个新的台湾意识，与传统的台湾意识、省籍意识是不一样的”。“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成为国际问题，在于台湾失去了主权国家的国格。台湾问题如果要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台湾安全如果要提高，只有主张台湾住民的全体自决，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而不是由国际强权或国共两党来决定”。<sup>[17]</sup> 不难看出，“台湾命运共同体”是谢长廷“住民自决”主张的理论基础。此后，“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台湾颇为流行，不仅民进党人常常将此挂在嘴边，甚至也为国民党高层所接受。1993年5月20日，李登辉在其就任“总统”三周年的记者会上提出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台湾命运共同体”的翻版。

第二、对“住民自决”的诠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民进党首任党主席江鹏坚在民进党成立后不久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特派员户张东夫时，就“住

民自决”解释说：“民进党之所以要提出‘住民自决’，就是因为台湾目前的政治没有出路，如果今天台湾可全面改选，国会也全面改造，那提出‘自决’的可能性就很小，提出的声音也很弱”。“简单来讲，我们提‘自决’只是一种手段，经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sup>[18]</sup> 87年初，江鹏坚在接受西德政治记者访问时再次表示：“民进党的‘自决’主张是一项程序，而不是结果，是对人民选择意愿的高度尊重。‘自决’和‘独立’没有必然联系”。<sup>[19]</sup> 民进党发言人尤清也表示“民进党不是台湾人运动”。<sup>[20]</sup> 显然，民进党主要领导在对外宣传时力图避免把“住民自决”和“台独”挂钩，这主要是因为民进党成立之时，国民党尚未开放“党禁”，国民党内的一些强硬派还扬言要取缔民进党，在这种生存危机还未排除的情况之下，民进党自然不敢以过激言论来刺激国民党当局。尽管如此，民进党内也出现了从“台独”立场来阐释“住民自决”的声音，如“台湾人自决，未必是分离运动，分离运动未必是非法”，“从血缘、血统的观念来阻碍自决运动已是一种落伍的论调”。<sup>[21]</sup> 而在86年底的“增额中央民代”选举中，民进党阵营更是出现了不少明显鼓吹分离意识的文宣，如“大陆人回大陆，台湾人留台湾”，“咱们新党站起来，为台湾找出路”等。从民进党成立初期党内对“住民自决”诠释出现的两种不同声音，已隐约可见民进党内的路线分歧。

### 第三节 党外“住民自决”实质分析

党外“住民自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政治背景，包括台湾特殊的历史遭遇、二战后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以及七十年代后台湾国际地位的丧失等。

首先，台湾的特殊历史遭遇及台湾民众因此而产生的特有心态，是“住民自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台湾被称为“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又有富饶的资源，很早就为外国侵略者垂涎。17世纪以后，台湾先后遭受荷、西、日、美、英、法等国的霸占和侵略，两度沦为外国殖民地，有近百年受外国殖民者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另一方面，台湾地处边陲，开发较晚，长期以来，台湾只是东南沿海渔民暂时栖息之地，前往定居的移民很少，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潮。由于台湾社会的移民性，在一些封建统治者眼中，台湾成为乱民聚集之地而受歧视。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

日本，更使台湾人民有被遗弃的感觉。在这种历史遭遇之下，台湾人民不愿任人宰割、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特别强烈。

其次，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独裁及所推行的错误政策，是“住民自决”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1949年，国民党政权被赶出中国大陆后，为了使其在台湾的统治合法化，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各种“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施行于台湾一省，作为其专制统治的“法统”基础。为了维持这个“法统”，国民党当局还将大陆带去的“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成员改为终身职。国民党就是以这种所谓的“法统”为基础，长期坚持一党专制独裁，致使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国民党在坚持一党专制独裁的同时，还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国民党逃台之后，先后通过了《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和“戒严令”等一系列高压政策，并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使得台湾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七十年代相继发生的“中坜事件”、“余登发事件”、“美丽岛事件”以及八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江南命案”等，都是这种政治迫害的结果。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还长期对台湾同胞实行歧视政策，人为地制造省籍矛盾，使台湾同胞没有受到和大陆同胞一样的对待，也使一些大陆迁台人员持有一种“统治者”的优越感，让台湾同胞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这种现象既表现在各种部门、机关、团体、公司人员的职务、级别上面，也表现在学生考试录取方面，甚至一个时期大陆籍的三轮车夫也比台胞的三轮车夫高一等，敢结伙成队欺负台胞三轮车夫和乘客。<sup>[22]</sup> 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白色恐怖和歧视政策下，因长期饱受外国殖民统治而存在于广大台湾民众心中被压迫、受凌辱的历史创伤，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日形扩大。国民党政权也被看成是“外来压迫”的象征。

第三、七十年代台湾国际地位的丧失，是党外“住民自决”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当局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一是建立在美台正式“外交”关系基础上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是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在72年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台湾当局旧有“外交”体制的两大支柱，一根已经轰然倒塌，另一根也开始松动。影响所及，原来承认台湾当局的国家纷纷与之断交。从1971年至1978年，台湾的邦交国从66个降至21个，其间与之断交的国家就包括台湾当局最重要的邦交国美国。台湾当局在“外交”上一连串的挫折，特别是美台正式“外交”关系的终结，不仅使台湾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也让台湾民众产生

命运又一次受人摆布的心理反映。党外“住民自决”的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

通过分析“住民自决”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以及党外运动发展的历史，对党外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可以有以下认识。

第一，“住民自决”不等同于“台独”。“台独”是要求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住民自决”有多方面的内涵。首先，从台湾特殊的历史遭遇看，“住民自决”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台湾人民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当家作主、追求“出头天”的反映。其次，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住民自决”也是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民主权力的武器。从这两方面分析，“住民自决”的主张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党外“住民自决”的分离主义内涵也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在党外反对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得到海外“台独”势力的声援，党外势力和“台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外“住民自决”的主张也是脱胎于台独分子的“自决”要求，和“台独”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住民自决”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党外主张“台独”的人士迂回宣传“台独”的最好方式。正如当时党外一位编辑所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谈论台独，这样我们会被关入牢房，因此我们说实行自决，这意味着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的前途”。<sup>[23]</sup>而且“台独”分子对由“自决”走向“台独”一直非常乐观。早在彭明敏提出“自救”主张的时候，彭就非常自信地宣称，只要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作巡回全岛的宣传，就可让台湾民众接受独立的主张。陈隆志在《台湾、中国和联合国》一书中也十分乐观地认为：“只要给予台湾人民自由选择之权，台湾人民会以压倒性多数选择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脱离中国”。<sup>[24]</sup>民进党成立后，该党主要领导虽然辩称“自决”和“台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上在许多民进党人士眼里，“自决必然导致台独”是不容置疑的。“住民自决”列入党纲之后，民进党内对“住民自决”的诠释就已经出现了“台独”的声音，这股声音在未来的岁月中渐渐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正是顺着“住民自决”这一阶梯，拾级而上，日见日高。

注释：

[1] 翁成受：《台湾经济 40 年发展概观》，《中国经济》（香港），1990 年第 1 期。

[2] 参见若林正文：《台湾，分裂国家的民主化》，台湾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第

253 页。

- [3] 陈若曦:《台湾党外再出发》,香港《七十年代》,1982年第2期。
- [4] 《创刊五周年杂感》,台湾《八十年代》,1984年第1期。
- [5] 参见谭志强:《响亮的口号、危险的游戏——台湾“住民自决”法理分析》,香港《明报》,1987年6月26日,第26版。
- [6] 同上,1987年6月27日,第26版。
- [7] 《“台独”活动大事记》,贾亦斌编著:《论“台独”》,台湾海峡评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95页。
- [8] 姚嘉文、陈菊编:《党外文选》,姚嘉文律师事务所发行,1990年5月,第48页。
- [9] 同上,第51页。
- [10] 同上,第170页。
- [11] 《美国国会记录》,1980年8月27日,《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第1159页。
- [12] 《民进党应该修改“住民自决”主张》,香港《中报》,1986年12月16日。
- [13] 台湾《新潮流》丛刊,第21期。参见杨锦麟:《“住民自决”剖析》,《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3期。
- [14] 《民主进步党党纲》,李达编著:《台湾党外运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2月,第32页。
- [15] 香港《百姓》,第113期,1986年2月。
- [16] 《美洲华侨日报》,1985年11月4日。参见林劲:《海内外“台湾自决”主张与台湾前途及海峡两岸关系》,《“台独”研究论集》,台湾海峡评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67页。
- [17] 台湾《联合月刊》,1987年第1期。
- [18] 户张东夫:《民进党主席江鹏坚访问录》,香港《广角镜》,1987年1月号。
- [19] 台湾《大华晚报》,1987年2月14日。
- [20] 台湾《民众日报》,1986年12月8日,第2版。
- [21] 吴昱辉:《我们不是“独立”,只是“自决”而已》,《“自决”是台湾人自救的唯一出路》,美国《公论报》,1987年1月26日,第9版。
- [22] 苏新:《论“台独”》,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6期。
- [23]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自决,台湾危险的口号》,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14日。

[24] 同注[6].

## 第二章 从“住民自决”到“台独党纲”——民进党 “台独”诉求在内外斗争中升级

民进党带着“住民自决”这块“台独”胎记诞生，经过几年的发展，到 91 年 10 月，民进党“五全大会”时通过了“台独党纲”。这个一直被外界认为具有“台独”特质的最大在野党，终于褪去了最后一层包装，沦为名副其实的“台独党”。其间的过程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这些矛盾既有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路线分歧，也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冲突，还夹杂着民进党、国民党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间的合纵连横。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正是在这种内外斗争中不断地升级。

### 第一节 民进党内不同派系的路线和权力斗争

“派系的出现与发展，是任何政党都无可避免的事实，即使极权政党也不能例外”。<sup>[25]</sup> 民进党是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由反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派系政治更是表现得特别明显。民进党成立初期，党内的主要派系除了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之外，还包括以康宁祥为首的康系及超派系、林正杰为首的前进系。在民进党成立之初，由于美丽岛系主要人物还身系囹圄，所以该系在党内的力量十分薄弱。康系及超派系则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新潮流系由于在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即控制了党内的组织大权，加之其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使该系在民进党内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7 年 5 月，黄信介和张俊宏出狱后，遍游全岛，把原来零星散处于全岛各地的泛美丽岛系成员重新联合起来，美系力

量迅速壮大，俨然成为党内的第一大派系。康系则经过几次全代会而影响日微，最后在民进党“三全大会”上一分为二，分别被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吸收。而前进系的力量也在同时并入泛美丽岛系。这样民进党内就形成了美、新两系分庭抗礼的局面。两系在激烈的路线和权力斗争中艰难地维持合作主导了民进党随后数年的发展进程，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

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分别脱胎于党外“公政会”和“编联会”，也是党外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斗争的产物。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温和路线成为党外的主流。八十年代前期，激进的党外新生代开始向温和派争夺领导权，这股新生的政治力量以党外杂志的编采人员为主体，他们以83年的批康运动为起点，对温和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在这一年的9月成立了一个主张走激进路线的政治团体——“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编联会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如邱义仁、吴乃仁、林浊水、洪奇昌等都是来自当时党外杂志《新潮流》的人员，民进党成立后，编联会便以“新潮流”命名，成为今日的新潮流系。编联会成立后的次年，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员由康宁祥出面，成立了执行温和路线的团体——“党外公职人员政策联合会（简称公政会）”。“美丽岛事件”后，受难者家属和辩护律师如许荣淑、周清玉、尤清等纷纷投入选举，成为党外新的公职集团。这些人在公政会中成立了一个次级团体——“美丽岛连线”，并成为公政会中的核心，民进党成立后的美丽岛系即由此而来。黄信介、张俊宏、许信良等被释狱或免罪之后，也就成为该系的当然领导。

美、新两系的主要成员由于阶级属性、参与政治历练及意识形态不同，导致他们在政策路线上存在很大分歧，包括对民进党的终极目标、对民进党的阶级定位以及对台湾的前途等，两派都存在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台湾前途问题上，即民进党该选择怎样的“台独”路线，两派分歧明显，并且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外界通常称之为民进党内的“统独”之争。美丽岛系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宜多谈统独，而是应致力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再向实质“台独”的方向发展。因为“政治的本质，原就是力与理的不断折冲”，“在在有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外有中共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民进党尚未在台湾凝聚出多数支持以前，即诉诸不具实质意义的口号‘台独’，试图与大陆对抗，是不明智之举”。<sup>[26]</sup>统独问题并不是台湾当前最主要的问题，目前台湾的当务之急是先落实民主改革，诸如推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等等，因为民主能够实现，台湾前途才能直接诉诸民意，为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铺路。新潮流则是“台独”至上，认定“台湾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